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阙当代不言”说辨析

孙 明 君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今圣历方兴”以下曰:“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避于恩怨之间。”刘勰在《时序》及其他篇章中不仅多次言及当代,而且对宋齐文学作出了彼此矛盾的评价。纪昀将“阙当代不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未经论定”和“有避于恩怨”似乎并不确切。刘勰避而不谈当代具体作者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心雕龙》的重点在于建构一个儒家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只是建构这个理论体系时的材料;二是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刘勰没有条件接触到大批的当代作家。

关键词: 纪昀;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萧齐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041-07

清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今圣历方兴”以下曰:“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避于恩怨之间。”①《时序》中是否存在“阙当代不言”的问题?其他篇章中是否也存在“阙当代不言”的问题?如果《文心雕龙》存在“阙当代不言”的现象,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纪昀认为刘勰《时序》“阙当代不言”,并且提出了刘勰“阙当代不言”的两个原因:一是当代作家“未经论定”,一是“有避于恩怨之间”。在以往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很多学者都默认了纪昀“阙当代不言”的提法。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或探究刘勰“阙当代不言”的种种缘由,或指陈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②本文拟在前修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就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时提出的“阙当代不言”及其原因加以初步辨析,就教于大家。

一

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论述当代文学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③这个矛盾表现为他对萧齐文学采用既颂美又贬斥的态度。颂美集中在《时序》一篇,贬斥散见于《通变》等其他篇章中。

《时序》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这一段话论述宋齐文学,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刘勰歌颂了萧齐帝王的文学政策和对文学的贡献。清人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在论述《文心雕龙》成书于萧齐时说:“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

收稿日期:2015-02-16

作者简介:孙明君,男,甘肃静宁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384 页。

② 例如:力之:《〈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辩——兼说其论宋代何以仅“略举大较”》,《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韩泉欣:《刘勰论宋齐文学及文学的古今之变》,《贵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阮国华:《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学术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阙当代不言”中的“当代”是特指“皇齐”时代。由于宋齐文学前后相承,很多文人由宋入齐,因之本文的“当代”以萧齐时代为主,也兼及刘宋时代。

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①换一个角度看,刘毓崧此言充分肯定了刘勰对萧齐帝国的重视和忠诚。刘勰之所以如此颂美萧齐帝王,是由于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帝王占有重要位置。《时序》曰:“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帝王是影响文学走向、推动文学发展的首要因素。他用“运集休明”来称颂萧齐时代,用“圣武”“睿文”“上哲”来称颂萧齐帝王,或许也包含着为自己将来的仕进打好基础的意思。刘勰在《时序》之外的篇章中,对萧齐文学多有批评,在这里他指出当今皇上至圣至明,言外之意,这个时代的文坛弊病,和当朝皇帝没有关系,只是文人们不自雕励而已。

其次,刘勰在《时序》中大力称颂萧齐文学。《时序》认为:当今之世,“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王运熙先生说:“这里对宋齐两代文学,除‘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一句外,都是笼统赞美之辞,实际并不体现刘勰真实的看法。”②这不只是王运熙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许多学者一致认同这里只是一种泛泛的称颂、笼统的赞美。纵然如此,有没有这样泛泛的笼统的赞美,效果应该是大不一样的。它起码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政治态度。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时序》在论述前代与当代文学时的确是有一定区别的。《时序》谈古今情理,从“昔在陶唐”“有虞继作”开始,一直谈到了萧齐时代。对照来看,他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试举建安文学和刘宋文学为例。《时序》论述建安文学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论述刘宋文学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论述建安文学时,刘勰指出了曹操、曹丕、曹植三位在建安文坛的领袖地位,也论述了王粲、陈琳、刘祯、徐干、应玚、阮瑀等人聚集邺下,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等人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他们共同开创了“俊才云蒸”的新时代。在论述刘宋文学时,除了歌颂几位帝王之外,只是点出了王袁颜谢何范张沈八家姓氏。在刘勰眼里,刘宋文学是“缙绅之林”,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士族文学兴盛的时代,他列举出“王袁联宗”“颜谢重叶”,显然他以“王袁颜谢”为文学领域中的四大家族。同样,“何范张沈”也不只是指四位诗人,而是排名在王袁颜谢之后的次四大文学家族。其中的“颜谢”当然包括元嘉三大家中的颜延之和谢灵运,但又不止这两位诗人,而是指颜谢两大文学家族。说到萧齐时代,只说这是一个“才英秀发”的时代,他们“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刘勰说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不配言说,要等待比我高明的人来说。既没有像建安文学那样点出具体作家,也没有像刘宋文学那样点出若干文学家族。

虽然刘勰说过“鸿风懿采,短笔敢陈”,但他歌颂了萧齐帝王对萧齐文学的贡献,并论述了萧齐文学的整体成就,并认为萧齐时代是一个文学鼎盛的时代,因此就不能说他“阙当代不言”。同时,他的确对具体作家没有加以点评。

二

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中,刘勰对萧齐文学作出了与《时序》截然不同的评判。《明诗》论宋初山水文学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物色》论近代文学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29 页。

② 王运熙:《刘勰论宋齐文风》,《复旦学报》1983 年第 5 期。

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刘勰在这里归纳了宋齐文学的一些新变,例如“情必极貌”“辞必穷力”“文贵形似”“曲写毫芥”等。单纯读这两段文字,还看不出来刘勰对宋齐文学所持的贬斥态度。就算刘勰不太喜欢这样的新变,最起码应该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吧。但是,结合《体性》等篇章来看,刘勰对这样的“新变”极其反感。《体性》云:“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定势》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在刘勰眼里,近代以来的新变并不是一种好现象。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刘勰否定萧齐文学的观点更加明确。《通变》云:“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是刘勰对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按照刘勰的思路,文学的衍变从“淳而质”开始,相继发生了“质而辨”“丽而雅”“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的变化,其变每下愈况。从宋初以来文学创作进入到一个“讹而新”的新常态。

刘勰认为,近代以来新奇讹滥的文风表现在许多方面,《文心雕龙》用大量的篇幅予以揭示和指斥。例如:《指瑕》云:“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致之言,终有抚叩酬即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从字与义的角度,批评了“比语求蚩,反音取瑕”的现状。《乐府》云:“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宋齐时代民歌和俗文学声势浩大,刘勰对宋齐时代盛行的乐府民歌甚为反感,将其称之为艳歌淫辞,视为当代的郑声。以上种种现象皆是宋初以来文学创作“讹而新”的具体表现。

他在《时序》中称萧齐文学“跨周轹汉”,无比辉煌;在《通变》中却说宋初以来的文学“讹而新”,在《定势》篇中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也就是说,刘勰一方面在大力歌颂这个时代,一方面又在极力指斥这个时代。对于这样的矛盾,多数学者都认定“跨周轹汉”云云只是一种泛泛的称颂、笼统的赞美,不可以当真,刘勰的本意还是在于批评时代的弊病;也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论文之所以不涉及当代,并非‘避于恩怨’或‘避忌’,而是因为当代文‘讹’极而不称于‘盛德’。褒之,有违本心;贬之,有损‘休明’。论宋而仅‘略举大较’,乃因如此既免陷于两难,又有以寄其矫‘讹’之意。”①其实,不论是赞美还是贬斥,刘勰都是发自内心的。刘勰对当代文学作出了既褒又贬的判断,让自己陷入了两难之境,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这种矛盾正是刘勰内心深处思想矛盾的自然投射。作为皇齐帝国一个忠实的臣子,将来也想在仕途上获得一官半职,他没有理由不歌颂这个时代;按照儒家正统文化的文艺标准,作为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他又不能不批判这个时代。刘勰在《序志》中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赞美当朝的帝王和文学创作同乎旧谈,乃是老生常谈,但不得不谈;用儒家思想来衡量当代文学,得出了异乎前论的结论,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理该如此。

由此可见,刘勰在《时序》中言及了当代文学,在其他篇章中也大谈当代文学,并且对当代文坛做出了与《时序》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矛盾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① 力之:《〈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辩——兼说其论宋代何以仅“略举大较”》。

三

不论是在《时序》中还是在其他篇章中,刘勰始终没有点评过当代作家。如果将"阙当代不言"改作"阙当代作者不言"则庶几近之。关于刘勰不言当代作者的原因,刘永济先生认同纪昀的观点,并加以引申说:"宋齐世近,作者尚多生存,又皆显贵,舍人存而不论,非但是非难定,且亦有所避忌也。故列代虽十,而衡论文变,止及晋世。"①纪昀把"未经论定"作为刘勰"阙当代不言"的一条主要理由,似乎不能成立,在刘勰同时稍后,钟嵘的《诗品》就涉及了当代文士。可见"未经论定""是非难定",并不能作为"阙当代作者不言"的主要理由。

那么,"有避于恩怨"说是否符合事实呢?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深有感慨地说:"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不能完全责怪作者"寒暑笔端",我们翻开史料,其中记载着很多因为文学而引发的恩怨。

其一,封建皇帝大都自我意识膨胀,不能容忍臣子在才艺方面超越自己。唐人刘竦《隋唐嘉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旧说以为隋炀帝因嫉妒薛道衡诗才而加害于他,当代读者都知道隋炀帝嫉妒其才并不是薛道衡获罪的主因。不过,即使是此事不确,帝王"不欲人出其右"的心理应该是真实的。《南史·鲍照传》云:"(鲍照)迁秣陵令。文帝以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连鲍照这样自称"孤且直"的士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缺乏操守的士人。《梁书·沈约传》云:"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记忆力不可超过皇帝,诗文水平当然也不能超越皇帝。不过,怕遭帝王嫉妒这一点,对于刘勰来说是不存在的。刘勰当时身微言轻,没有直接见到过萧齐皇帝的机会。何况,他在《时序》中已经大力称颂过当朝皇帝。

其二,在士人之间,因为史学论著和诗赋创作也会造成一定的恩怨。《晋书·袁宏传》:"宏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耳。'……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这就不是恩恩怨怨所能范围了,袁宏作赋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北齐书·魏收传》:"范阳卢斐父同附出族祖玄传下,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斐、庶讥议云:'史书不直'。收性急,不胜其愤,启诬其欲加屠害。……时太原王松年亦谤史,及斐、庶并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卢思道亦抵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魏收因为写史引来了众口喧然,树敌无数。

虽然历史上因为著述引起过诸多恩怨,但刘勰作文有自己的底线,他在《史传》说:"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刘勰推崇"秉笔荷担"的写作态度,反对"任情失正"的写作方式。如果因为有避于恩怨而不去评论当代作家,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方式,这不符合刘勰为文的原则。退一步说,如果为了避于恩怨而不评论任何一个作家,似乎

①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8 页。

是高明的,其实是愚蠢的,不评论任何一个作家,就等于否定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事实上会得罪所有的当代作家。《梁书·刘勰传》曰:“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为了《文心雕龙》能为世所知,必须要借助于“贵盛”的名士。刘勰既然会以这种方式拜会沈约,说明他非常敬重沈约。虽然如此,刘勰并没有点评、歌颂沈约的诗文。显然,刘勰是有意对当代作家不予点评。而当代文坛领袖沈约也对刘勰阙当代作者不言的做法心领神会,赞扬他“深得文理”。

显然,即使“有避于恩怨”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是刘勰“阙当代作者不言”的主要原因。

四

《文心雕龙》阙当代作者不言应该有多重考虑,其主要原因中不能排除以下两点因素:

首先,刘勰的《文心雕龙》意在建构一个儒家文学理论的体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的动机不仅与沈约完成《宋书》、萧子显完成《南齐书》不同,即便与钟嵘完成《诗品》的动机也不相同。历史著作讲究实录,要忠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不待多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之间也有区别。钟嵘《诗品序》:“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有感于文士“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社会现象,钟嵘《诗品》仿照九品论人法,对历代五言诗作者进行分品点评。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用儒家的思想来矫正当今的文学创作的走向,同时也意在为儒家文学思想修筑一座理论的大厦。据前辈学者研究,刘勰是在三十岁之后撰写《文心雕龙》的。当时,刘勰虽然在定林寺以学习和整理佛教经典为主,但他思想上依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顶礼膜拜。《文心雕龙·序志》阐述写作动机曰:“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上述文字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有两点:一是刘勰解释为何要写作《文心雕龙》一书。“敷赞圣旨,莫若注经”,但古往今来,儒家经典已经有了诸多经师。唯有作为经典枝条的文章需要清理。儒家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刘勰也想借助立言达到不朽。二是刘勰提出了他对文章发展的根本看法:“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就是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构建一个理论大厦,这个大厦从地基到材料都需要经过儒家文艺思想的测量和检测。为了让文学重新回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为了实现原道、征圣、宗经的崇高目标,他要求文学创作要向经典雅正的文风学习。所以,史学著作不能不涉及所写时代的重要人物,文学批评著作不能不点评所写时代的具体作家。而文学理论著作则重在提出一种理论体系,不同的作家只是用来阐释这种理论的材料,刘勰没有必要一定非要使用当代作家作为他著书立说的材料。是故,我们看到刘勰对时弊的针砭是严肃的,但他对事而不对人,对当代作家并没有进行指名道姓的贬斥。他反对背离儒家经典的文风,从儒家经典出发来判断问题的对与错。他批评的重点在于文化制度建设,而不在于批评本身。

其次,身处寺庙与佛典之中,与青灯黄卷为伴的刘勰,没有机会接触到大批的当代作家。《梁书·刘勰传》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据牟世金先生考证,永明八年(490),刘勰二十四岁,是年二月之后守丧期满,入定林寺。“自本年至天监二三年出寺,计十三四年,与本传

‘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相符。”①齐梁时期,很多高僧先后居住于定林寺,为南朝佛教活动之中心。很多名流居士慕名而来,时常出入山门。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曰:“定林寺,即上定林寺,亦称定林上寺。故址在今南京市紫金山。自宋迄梁,寺庙广开。高僧如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辨、慧弥、法愿辈皆居此寺。处士名流如何点、周颙、明僧绍、吴苞、张融、袁昂、何胤等,王侯如萧子良、萧宏、萧伟之徒,亦节策踵出门,展敬禅室,或咨戒范,或听内典。曾极一时之盛。”②刘勰生活在寺院当中,只有僧人、佛典与他朝夕相伴。虽然定林寺中有很多当代名流出入,一则这些名流主要是为了佛事而来,他们关心的重心不在文学创作上;二则名士是冲着僧佑等大师而来的,他们并不会与刘勰这样寄身寺院者商讨当代文学的诸种现象。刘勰既然远离世俗生活,远离当时的诗人群体,生活环境注定了他只能以寺院寄养人的身份与眼光看待文学和世界。

《高僧传·僧佑传》曰:“释僧佑,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业。……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初佑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的僧祐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六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世界记》十卷、《萨婆多师资传》五卷、《释迦谱》四卷、《大集等三经记》一卷、《集三藏因缘记》一卷、《律分五部记》一卷、《经来汉地四部记》一卷、《律分十八部记》一卷、《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一卷、《善见律毗婆沙记》一卷。后人认为这些典籍中有许多出自刘勰的手笔。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篇注:“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③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曰:“僧佑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④僧祐名下的典籍中,到底哪些是僧祐自作,哪些出自刘勰之手,还需要继续鉴定甄别。既然《梁书·刘勰传》很肯定地说:“(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那么,刘勰多年来在佛学方面潜心钻研,整理并写作过一些佛教著作,当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寺院中的刘勰以佛教典籍的整理为中心,同时也研读了大量儒家典籍,那么他用在当代文学现状方面的精力必然是有限的。

同期的沈约、萧子显、钟嵘等人接触面都比刘勰广泛。沈约在齐初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家令,后来又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有条件接触当代杰出文人。沈约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之一,《梁书·武帝本纪》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也是当时声律说的创始人之一,《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他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的前沿,一度是文坛上手执牛耳的人物。《诗品中》说:“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约称独步。”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梁武帝天监元年,萧子显十三岁。齐梁易代之后,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他身处社会上层,自然有与当代名士交往的条件。钟嵘生于颍川长社钟氏,长社钟氏曾为郡国大族,四海通望。到了南朝还属于次等士族之列。钟嵘在齐梁曾任参军、记室一类官职。《诗品》中品评的梁代诗人有中书郎邱迟、太常任昉、左光禄沈约、秀才陆厥、常侍虞羲、建阳令江洪、步兵鲍行卿、晋陵令孙察等。显然,他的接触范围也比刘勰要广泛得多。

刘勰《文心雕龙》为什么没有涉及晋宋田园诗人陶渊明,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①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8页。
② 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30页。
④ 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第62页。

《时序》论刘宋文学云:“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在刘勰眼里,刘宋文学最大的特征是士族文学的兴盛,非士族文学则在他视域的盲区当中。陶渊明虽然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但他的诗歌不符合士族社会的欣赏习惯,未能像士族诗人的诗篇那样广泛流传。刘勰自成年后,常年生活在寺院里,环境相对闭塞,没有条件接触和了解当代作家。是故,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与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失之交臂。

概之,刘勰在《时序》和其他篇章中不仅多次言及当代,而且对宋齐文学有彼此矛盾的评价。纪昀将“阙当代不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未经论定”和“有避于恩怨”似乎不够确切。刘勰避而不谈当代具体作者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心雕龙》的重点在于建构一个儒家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只是建构这个理论体系时的材料;二是由于刘勰特殊的生活环境,没有条件接触到大批的当代作家。

AnAnalysis of the Comments Made by Ji Yun about the Chapter Entitled *Shixu* from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un Mi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bout the chapter entitled *Shixu* (《时序》) from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文心雕龙》), Ji Yun (纪昀) commented that there were two reasons why Liu Xie (刘勰) didn't make a specific discussion about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One reason was that people failed to reach a consensus about those writers at his time, and the other was that Liu Xie didn't want his views to be affected by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writers. However, Liu Xie talked about hi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 many times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made contradictory evaluations about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ng and Qi Dynasties (宋齐). Ji Yun's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above two reasons were seemingly unprecise. In this article, we formed two of our own reasons. First, the focus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was to establish a Confucian literary theoretical system, whereas hi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s just part of the materials in this construction. Second, because of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Liu Xie had no chance to contac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Key words: Ji Yun (纪昀), Liu Xie (刘勰),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文心雕龙》), *Shixu* (《时序》), Qi Perio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萧齐)

(责任编辑　郑　园)